



.....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 对中国的影响 及其对策研究

.....

范树成 著

.....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 对中国的影响 及其对策研究

.....

范树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范树成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

ISBN 978 - 7 - 5097 - 9985 - 7

I . ①国… II . ①范… III. ①国外 - 意识形态 - 影响
- 研究 - 中国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384 号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著 者 / 范树成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仇 扬 安 静 何晋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8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985 - 7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前　言

意识形态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既包括理论建设，又包括实践建设。因此，本书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两个层面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意识形态并未像西方有些人所鼓噪的那样“终结”，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了强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种旧的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变化，新的意识形态不断涌现，意识形态的建设实践策略也不断更新。无论是各种性质的政党，还是各个流派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政党层面也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外各种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交流的扩大，以各种形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本书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研究我国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面极广的问题，既涉及理论问题，又涉及实践问题；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包括其他性质国家的意识形态；既包括国家或政党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观点。要对这些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做出清晰、明确、系统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本书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的研究力求有所侧重。

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自然需要确定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的意识

形态观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阶级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实际上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是某一政党或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对国家、对人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本书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列出专章或专题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然而意识形态并非只有国家意识形态一种，除国家意识形态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就曾谈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这显然指的是个体意识形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在当代，意识形态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多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如消费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符号意识形态等。与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意识形态从某一角度或某一领域关注社会现实，力图通过这些学说改变人们的认识，改变社会，这些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根据研究目标与需要，本书对这些意识形态有的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有的则分散在相关部分进行探讨。

传统意识形态研究将所有意识形态都看作政治意识形态，将非常丰富的意识形态现象简单化。然而，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提出并广泛流行、对人们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突破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如果按照传统的意识形态观不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我们就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当代社会。按照一些学者的新的观点，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是指那些反映政治领域，涉及政治权力或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反映非政治领域，同政治没有直接联系，但具有政治功能的意识形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消费意识形态和科技意识形态等形式的意识形态承担了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维护现行政治制度，对人进行操纵、控制的政治功能，因此它们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我们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就属于非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在反映的领域、表达方式、运行机制、作用机理、存在方式等方面都有区别。由于非政治意识形态在当代具有多种形式，而且其影响也不可忽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迪价值，因此，我们也将对其进行研究，不过不是列出专章和专节进行研究，而是将其在相关部分进行分散研究。

本书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研究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

影响出发，着眼于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的著作，它突出为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外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研究体系，因此，当代国外虽较流行但对我国影响不大的意识形态，本书并未进行研究。

本书主要是从当代这一时间点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进行研究，是一种横断面的研究，侧重于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因此，对国外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脉络、历史未作研究。

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变化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就宏观维度而言，有传统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发生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与发展、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就微观维度而言，学者们对当代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特征与功能、形成机制与作用机制等方面的认识也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本书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的研究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的。

本书力求在意识形态基本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策略方面有所创新。本书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

从多维度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即从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当代新出现的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原因等维度研究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既注重研究国外意识形态实践方面发生的新变化，也注重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理论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并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从内容到形式，从存在方式到传播方式，从特征到功能、从形成机制到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具有全面性。

系统地揭示了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即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研究、符号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经济学研究、解释学研究，并注重从这些视角与方法提出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的思路。

本书对意识形态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国外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情况将意识形态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与反主流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显性意识形态与隐性意识形态；内容性意识形态与功能性意识形态；理性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与“物化”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类型研究具有新意。

本书系统、全面地概括和揭示了当代国外意识形态变化的新特点，即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中间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与人性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化与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的实用化；意识形态的隐性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强化的现实并存；意识形态的泛化。

本书对意识形态的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意识形态由内容型要素与形式型要素构成。内容型要素包括知识要素（理论学说）、价值要素（价值理念）和实践要素（战略与策略），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点。意识形态的形式型要素包括“硬核”和“保护带”。价值要素是意识形态的“硬核”，它规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知识要素和实践要素是意识形态的“保护带”，从根本上说它们是非阶级性的，它们可以吸收、借鉴其他意识形态的合理要素。意识形态的结构研究具有创新性。

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妥善处理主导性与多样性，科学性、阶级性、人民性与人性，继承性与创新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建构性与批判性，原则性（价值性）与包容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建设“和谐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路径（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超越本本，解放思想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吸收借鉴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各种错误思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现代化、感性化、生活化、文化化、心理化、隐性化具有全面性和创新性。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

形而下的实践研究与形而上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本书既注重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行研究，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同时，也注重对国外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从学理上探讨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提供思路和方法。

全球视野与本土立场相结合。从全球视野分析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及苏共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原因，借鉴国外意识形态建设与研究的合

理因素，同时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把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相结合。

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运用批判性方法对国外各种意识形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考察和批判，运用建构性方法，提出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策略。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注重对国外意识形态的国家、阶级、政治等宏观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的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注重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微观结构如意识形态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作用机制，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等进行探讨。

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结合。既注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国外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揭示其本质，又注重对意识形态进行形式（如特点、功能、表现形式、存在方式、运作机制）上的研究，以揭示意识形态形式上的共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提供借鉴。

多学科整合研究。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诠释学等学科为视角，将这些学科的方法进行整合，以形成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完整认识，从多层面、多角度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	001
一 苏共意识形态的僭越	001
二 苏共意识形态的教条化与僵化	010
三 苏共意识形态的封闭化	018
四 苏共意识形态的蜕变	021
五 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舛错	028
第二章 旧意识形态的新变化	041
一 当代新自由主义	041
二 新保守主义	049
三 新全球主义	057
四 后现代主义	067
五 新民族主义	074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085
一 后社会主义	085
二 后工业社会主义	098
三 生态社会主义	106
四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116
五 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126
六 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134
第四章 新研究视角下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142
一 文化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42

二 符号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49
三 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55
四 心理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60
五 经济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71
六 解释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177
第五章 意识形态新变化的特点	188
一 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中间化	188
二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195
三 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与人性化	206
四 意识形态的文化化与日常生活化	210
五 意识形态的实用化	216
六 意识形态的隐性化	220
七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226
八 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强化的现实并存	232
九 意识形态的泛化	236
第六章 当代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挑战与启迪	240
一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与 挑战	240
二 国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启迪	252
第七章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背景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总体战略	274
一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	274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	298
三 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的途径与方法	313
四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327
五 坚持科学发展观，克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端	330
六 扩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	332
参考文献	337

第一章 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意识形态的最大变化当属苏联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这种主导地位的丧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异化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苏联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它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① 所以，苏联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苏联的意识形态把社会团结了起来，从而保障了快速的工业化、空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使苏联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倚仗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全球秩序和世界稳定的一个支点”。^② 但是，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十分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 苏共意识形态的僭越

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动员人民群众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保卫和发展这一制度，苏联也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和提高人们的认识，使社会主义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

^① 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66页。

^② [俄]利西奇金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64页。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苏共进行各项工作的—个刚性的制约因素。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把意识形态神圣化、教条化、僵化、泛化，用意识形态裁剪一切，让一切适应意识形态，许多本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都被披上意识形态的面纱，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刚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苏联政权不得不首先为了满足理论的需要而裁剪现实。同时，刚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特殊地位，它不只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是伸张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每种政治和社会情况都具有一套不具妥协意象的预设的解释和行动典则。这样，苏联政府机构的设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等方面必然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胎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政权简直就是意识形态在进行统治。”^①

（一）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功能与一般的思想、观念、学术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因此，意识形态与一般的学术理论有着明确的分野，不能相互僭越。然而，苏联的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着突出的僭越现象，学术问题被不加区分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②的讲话。在讲话中，斯大林号召对经济领域流行着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给予“应有的回击”，主张对新经济政策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等都应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带来的政治领域的巨大转折，从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面的争论与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随后，斯大林又将1928~1929年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学者们曾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等问题展开过学术讨论。斯大林认为争论的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并认为这样做在

^① 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41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政治上“是合乎我们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斯大林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学术研究如果不与政治挂钩，不与意识形态联系就是“学究式的抽象议论”。这一认识给苏联后来正常的学术争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对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斯大林又推动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是苏联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僭越的又一重要标志。“谈话”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机械论派”与“辩证法派”之间的理论争论。这种争论起因于斯捷潘诺夫发表的具有“机械论”味道的观点。该观点发表后遭到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对，尤其是以德波林为代表的“辩证法派”的反对。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进行了谈话，由此，开启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出面直接干预理论争论的先河，为苏共确定在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这场“谈话”给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影响了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健康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难以消除的后遗症，自此，学术争论被意识形态化，正常的意识形态争论被终止，“学术争论”被“政治斗争”所取代。

在回答“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直接联系起来”^①这一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说：“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因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②斯大林指出，“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③在斯大林看来，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理论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一方面承认德波林学派并没有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按孟什维克方

^①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0页。

^②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0页。

^③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0页。

式思维的人”等政治帽子。在谈话中，有人问将德波林学派的观点定性为形式主义倾向是否正确，斯大林嫌这个定性太轻了，主张不能仅从学术性上定性，而应当从政治上定性，他指出，“形式主义者——这个术语太轻，太学术性了，应当加强”。^①由此，斯大林开创了运用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和争论的先例，开创了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裁决学术争论的对与错的先例。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人们可以就不同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可以展开争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是科学理论发展所必需的，是共产党人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是共产党人应大力倡导的。但是斯大林对待学术的不同观点在政治领域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主张“批判”“斗争”“全面进攻”。在回答“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的理论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的确，我在青年时代曾大量读过拉马克、魏斯曼的著作，曾着迷于新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有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这里撰写的有关自然科学理论的作品有很多物活论的东西。《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批判任务。”^②“你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③“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粪便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④他要求“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且每次都要检查自己的路线”。他甚至提出：“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所有的武器。”^⑤斯大林认为，“只有这样的批判和斗争才能大大推动理论思想，导致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的出现”。

对德波林学派进行的政治“批判”“斗争”“进攻”还未结束。1931

^①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0页。

^②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1页。

^③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50页。

^④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49页。

^⑤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49页。

年11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联共（布）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些争论问题做出裁决，将历史研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将该杂志发表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称为“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① 将一批党员史学家打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②

在斯大林的推动下，“斗争”“批判”“进攻”延伸到其他各个学术领域，如教育学领域对儿童学的批判、法学领域对帕舒卡尼斯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波克洛夫斯基学派的批判、自然科学领域对生物遗传学的批判，甚至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在苏联各个领域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与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

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将学术争论提升为政治斗争，可以带来理论的创新。这样的看法显然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样的“批判”“斗争”“进攻”不仅不能解决学术问题，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反而会导致学术的萎缩和政治斗争的扩大化。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逝世后，这种将学术争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混为一谈，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禁止科学问题的自由争论，对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批判，甚至诉诸暴力的现象虽有所改变，但并未得到根除，勃列日涅夫时期此种情况仍然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科学研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现象很严重，表现为：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由苏共中央决定，理论界的任务是对党的各项决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进行阐释和宣传。因此，每当党的重要会议之后，苏联的一些重要刊物或是高校、研究院都要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社会科学家围绕党的会议的决议或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展开所谓的“科学论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任务，而对本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则被忽视，社会科学研究完全成了政治与政治意识形态任意摆布的玩偶，沦为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婢女”。苏共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7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9页。

二十四大后，苏联理论界的“头号思想家”“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明确指出：“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们科学工作者规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科学地论证发达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手段。”^① 1972年8月1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的社论，该社论也讲了大致一样的话：苏共二十四大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规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阐明发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科学地论证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式。197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号召社会科学家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1976年10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以及苏联科学院召开讨论会，会议要求苏联学者深入阐明苏共二十五大的成果，深入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又进一步动员理论界深入研究发达社会主义问题。

第二，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学者、艺术家因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不合官方或领导的观点而受到批判甚至遭到迫害。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克隆罗德博士的批判。1971年克隆罗德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问题》一文，文中认为，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并认为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苏联不如美国。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中央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苏联理论界的非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会批评克隆罗德的观点。在遭受批评后，克隆罗德发表文章承认了自己的某些错误，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并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其修正后的观点仍受到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部会议的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上的异己分子虽然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会遭受坐牢杀头之祸，但仍有不少人除了在学术上遭受批判和封杀外，还受到行政上的处分，或被送进精神病院，甚至驱逐出境。《真理报》主编鲁米杨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烦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结果，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

意识形态僭越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人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各种

^① 安启念：《苏联哲学七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第149页。

科学问题上，科学被划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的内容阶级化。许多科学学派和科学家争先将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并以此展开对同领域中的不同学派和持不同观点者的批判。一些研究领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帽子。例如，控制论、逻辑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物理学说、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等自然科学理论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许多生物学家被扣上“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由于一些学科被认为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其学术研究被禁止，例如优生学、儿童学、个体生态学和应用心理学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学术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僭越学术的情况下，学术研究成了粉饰现实的工具，学术研究萎缩甚至停滞。

（二）具体政策的意识形态化

一个执政党的具体政策与其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联系。执政党总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制定行动纲领和具体的政策。政策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在各个社会实践领域里的反映。因此，制定政策时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保持政策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本无可厚非。然而，政策与意识形态不同，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政策是针对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根据同一意识形态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苏联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定政策时忽视了这一区别，将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一致性极端化，形成了“政策的意识形态至上性”。^① 这种情况在苏联的不同时期都有所表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这种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不是按照社会现实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是人为地改变社会现实以使其与意识形态相适应，不顾现实生产力条件而制定改变生产力现状的政策，以使生产力与理想中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与支

^① 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93页。